

丁福林◎撰

鮑照年譜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福林◎撰

鮑照年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照年谱 / 丁福林撰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325—3840—0

I . 鲍... II . 丁... III . 鲍照(约 416 ~ 466) - 年谱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124 号

鲍照年谱

丁福林 撰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3840—0

K · 621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64063926

前　　言

鲍照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杰出作家，为刘宋元嘉体的代表诗人之一，也是元嘉铺陈诗风向永明体诗风过渡的关键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鲍照字明远，祖籍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子），后迁至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晋永嘉大乱，其先世又自东海南渡，流寓至江南之京口（今江苏镇江），鲍照则又家于当时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他生活的年代（约416—466），稍后于同时代的大诗人陶渊明（365—437），与和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谢灵运（385—433）、颜延之（384—456）并称为“元嘉三杰”。他出身寒微，自称“北州衰沦，身地孤贱”^[1]、“孤门贱生，操无炯迹”^[2]、“负锸下农，执羁末皂”^[3]。他在《请假启》一文中叙述家庭情况时说：“居家之治，上漏下湿。暑雨将降，有惧崩压。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锸陶涂，必须躬役。”可见家境相当贫困。在仕途上，他也一直抑郁不得志，除了在短期内任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以及数任县令外，大部分时间只是在藩邸任王国侍郎这样的低级的事务性官职。晚年又被迫离乡背井，前往荆州江陵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军府参军，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为乱兵所杀，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鲍照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汉魏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现实。

其中一些诗篇表现了外族入侵威胁下的民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灾难,以及南朝统治者对士兵的压迫和奴役,表现对当时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反感,并抒发他强烈的报国立功的爱国思想。另一些诗篇则多方面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和官场上逐物竞利的丑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对劳动人民“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岁暮井赋迄,程课相追寻”、“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4]的悲惨境遇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不合理的士族门阀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有关妇女题材的诗作中,则描绘了当时饱受生活折磨和精神奴役的被压迫妇女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了她们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以上这些即组成了他诗歌创作中最光辉的部分。

鲍照的诗歌创作,与大诗人陶渊明不同。陶渊明不写乐府诗,而致力于五言古诗的创作。鲍照则除五言古诗而外,还大量创作乐府诗。鲍照创作乐府诗又不同于西晋诗人陆机,陆机的乐府诗几乎完全是模拟,而鲍照则借乐府旧题以寄托新意或创造性地自创新题。同时他不仅写下了大量五言乐府,而且还创作了二十多首七言和杂言乐府,对七言诗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人赞其“乐府诸章,更超忽变化,生面独开”^[5],又说“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6],正说明了他乐府诗作的创造性。由于这种创造性,使其诗歌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鲍照的诗歌,大部分气势激昂,热情奔放,音节顿挫昂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当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缉事比类,非对不发”^[7]的形式主义倾向大相径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诗歌评论家王夫之因而称其诗“吟咏往来,觉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8],大诗人杜甫也冠其诗风以“俊逸”^[9]二字。

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及其诗歌创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他确实可称得上是“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10]的重要诗人。

鲍照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而外,他的骈文和赋也都写得相当出色。其中有揭露不合理的门阀制度,斥责“吮痈舐痔”、“贩交买名”的无耻小人的《瓜步山竭文》;有反映内忧外患而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芜城赋》;有“其辞奇丽,超绝笔墨蹊径”^[11]的描绘旅途所见祖国山河雄奇壮丽景色,以及抒写自身复杂心情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也有奇突古兀、刻划奇伟壮美山川的《石帆铭》等。这些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曾得到“如万仞峭崖,独绝人踪”^[12]的高评,是他文学创作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鲍照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中也夹杂了许多封建糟粕,消极情绪和宿命论的思想,委屈求全和对统治阶级感恩图报的心理,皆时有所见。在表现形式上也受到时风的局限,诗文中时有矫揉造作之句出现。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对待。

年谱是知人论世的准备工作和前提,像鲍照这样的我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对他的生活时代和生平事迹以及创作活动等作出较为详细完整的记述,是很有必要的。为此,前辈专家经过长期的研究探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后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较多的方便。近年,由于学术界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故旧的年谱、年表似乎已有重新修订的必要。本谱即是在旧有谱、表的基础上,吸取近年来鲍照研究中的新成果,并结合笔者研讨之心得,以图对他的生平事迹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记述。

本谱除了对鲍照的生平事迹作出较为详细的考实以外,还

记载了他所生活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兼而考实了与其有交往的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活动情况。力图通过这些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以及诗人社交活动的大致状况，以便读者通过本谱能更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这位杰出作家的全貌。但由于流传至今的材料有限，加上笔者见陋识浅，本谱难免有疏漏讹误之处，尚祈专家和读者们予以批评指正。

注：

- [1] 鲍照《拜侍郎上疏》。
- [2] 鲍照《解褐谢侍郎表》。
- [3] 鲍照《谢秣陵令表》。
- [4] 鲍照《拟古·束薪幽篁里》诗。
- [5] 张荫嘉《古诗赏析》。
- [6] 沈德潜《古诗源》。
- [7] 《南齐书·文学传论》。
- [8] 王夫之《古诗评选》。
- [9] 杜甫《春日忆李白》。
- [10] 胡应麟《诗薮》。
- [11] 王应麟《困学纪闻》。
- [12] 钱振伦《江鲍二家文钞序》。

鲍 照 年 谱

鲍照字明远。唐人避则天武后讳，或作“鲍昭”。

按：《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南齐虞炎《鲍照集序》皆云：“鲍照字明远。”《宋子京笔记》云：“今人多误‘鲍照’为‘鲍昭’，李商隐诗云：‘浓烹鲍昭羹。’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鲍照’字。”《潘子真诗话》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时讳‘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照’或作‘昭’，盖唐人避武后讳所改。韦庄诗有‘欲将张翰松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句，押入平声，殊失其实。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北史》作于武后称制前者，实皆作‘照’，不作‘昭’也。”则明远本名照，而唐避则天之讳改作昭也。尝任宋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琰軍府參軍，后人因称之为鮑參軍。

按：《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皆云：“臨海王子琰为荊州，照为前軍參軍，掌书记之任。”虞炎《鮑照集序》亦云：“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后人因称其鮑參軍，钟嵘《詩品》云：“宋參軍鮑照。”杜甫《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无敌，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实开后人以鮑參軍称鮑照之先。

祖籍上党（今山西长子），东汉时迁至东海（汉晋时治鄒城，今山东鄒城），因又为东海人。

按：虞炎《鲍照集序》云：“本上党人。”记鲍照籍贯为上党。然而因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记鲍照为东海人，故后人多有以虞炎序所记为不确者。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照，东海人，……云‘上党人’，非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照字明远，东海人。晁公武《读书志》作上党人，盖误读虞炎序中‘本上党人’之语。”近人作论，亦颇有以鲍照籍贯上党为非是者。以上所说，乃偏颇不实之辞，盖于虞序未作深究所致耳。

考虞炎事迹，见在《南齐书·文学·陆厥传虞炎附传》，云：“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骁骑将军。”此外，《南史·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传》亦载长懋“文武士多所招集，会稽虞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顥、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虞炎对典章制度亦颇有所长，《南齐书·礼志》即载有其为骁骑将军时议郊祀事之一段议论，皆可见虞炎乃其时一位博学多才之著名文士。《隋书·经籍志》记有“《虞炎集》七卷”，其集虽已佚失，但今存仍有《玉阶怨》等诗四首。据《鲍照集序》称，此序乃其奉皇太子命而撰写，此皇太子即齐文惠太子萧长懋，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为太子，则虞序之作距鲍照卒年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最多仅二十七年，且永明年间虞炎又与编撰《宋书》之沈约同为长懋所亲遇，于鲍照事应有较多之了解，且其奉太子之命，对鲍照“流迁人间”之著作“备加研访”，编次成集而为之序，于鲍照事迹又应有相当之研讨，态度亦应颇为审慎，可靠性较大，更何况南朝人又甚重谱牒之学。因此，虞炎此序载鲍照籍贯决不可能出现明显之谬误，即上党说应为可信之辞。

曹道衡《关于鲍照的家世和籍贯》（载《文史》第七辑）云：“根据现有的材料，应该肯定虞炎所说的鲍照祖籍上党未必有

误。”所说是也。

又按：《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义庆附传》：“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南史》刘义庆本传所记与之同，据此，则鲍照之籍贯似又为东海。今考沈约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仅小鲍照二十余岁，鲍照泰始二年（466）卒于乱兵时，沈约已二十六岁，对鲍照事迹应当甚为了解，记其籍贯似不应有误。且沈约奉敕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春，至于次年，其中纪传七十卷已毕功奏上，则《宋书》之纪传实于永明五年前已大致完成。据《宋书·自序》，此书之编撰曾经数人之手。刘宋元嘉年间，著作郎何承天即已始撰之；其后，宋孝武帝刘骏又命苏宝生续述国史，“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又后，乃由徐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以上诸人所撰之《宋书》讫于宋孝武帝大明末而未毕功，沈约《宋书》即在此基础上经修订整理而成，其中除他以为的非实录之处而外，大部分即应本自苏、徐所撰。鲍照为东海人之说出自其书之刘义庆本传，据载，“义庆以宗室令美”，“足为宗室之表”，乃堪称“元嘉名臣”者，故此传及其所附载之鲍照本传极有可能即为苏、徐所撰者。考之《南齐书·文学·贾渊传》：“孝武世（刘宋孝武帝），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是苏、徐二人在宋孝武时曾与鲍照同为学士，对鲍照事应了解甚详，载其籍贯更不至有误。如此，则明远籍贯似又应以东海为是。

又按：《南齐书·伟臣传论》云：“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乃《宋书》而外，以东海称鲍照籍贯之较早者。因记鲍照籍贯有上党与东海二说之不同，故致使后人聚讼纷纭。其实，记一人籍贯而有二说，并不矛盾，史书记载亦多有此例。以鲍姓为例，如晋时之鲍靓，《晋书·艺术·鲍靓传》云：“鲍靓字太玄，东海人

也。”记鲍靓为东海人；然而同书之《葛洪传》却又记葛洪“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考《葛洪传》中之鲍玄，即《艺术传》中字太玄，并尝为南海太守之鲍靓。此点，前人已有定说。如此，则鲍靓又为上党人。同书之二传中记同一人之籍贯截然不同，此亦并非《晋书》之作者误记，而是因东海鲍氏之一支与上党鲍氏同祖，二者之间有一迁徙联系之故。如此，则称鲍照之籍贯为“本上党”或“东海”应皆可，而不必持其中一说否定另一说。

又按：鲍氏自上党至东海之迁徙情形如下。《汉书·鲍宣传》：“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宜长雄，遂家于长子。”鲍宣由渤海高城所徙居之上党，即秦汉以来属并州之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又考之《后汉书·鲍永传》，鲍宣徙居上党长子县后，其子鲍永，永子昱，皆家于上党屯留。长子、屯留毗邻，今地图所载，二县间尚有村镇名“鲍店”者。《魏书·地形志》云：“并州，……上党郡，领县五，……长子，……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有泉北流至陶乡，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有鲍宣墓。”足证鲍宣徙居上党后，其家族定居于上党长子，故鲍宣墓乃在此也。《后汉书·鲍永传》云鲍永，“建武十一年（35）征为司隶校尉”，后“拜兖州牧”；鲍永子鲍昱“中元元年（56）拜司隶校尉，……（永平）十七年（74）代王敏为司徒，……（建初）四年（79）代牟融为太尉”，凡再为三公；昱子鲍德亦“累官至南阳太守，……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亦九卿之一。世代卿相，声势煊赫，成了上党之望族。上党亦自此成为鲍氏郡望之所在。鲍氏自上党徙居东海则又始自鲍德，《元和姓纂》卷七：“鲍：东海郯县，汉太尉昱子德始居东海。”鲍德徙东海后，据《后汉书·鲍永传》，德子鲍昂“举孝廉，辟公府，连征不至，卒于家”，其后世则未有显者，故此后鲍氏虽族居于东海而郡望则高

标为上党，此所谓“聚族于东海，标望于上党”（清光绪二十三年鲍辅榦等重修之《鲍氏宗谱》序）者也。鲍靓东海人而《晋书·葛洪传》作“上党鲍玄”者，亦即此意。由此观之，虞炎奉皇太子命为鲍照编集并作序，为标榜其郡望而称其“本上党人”，沈约作史传而仅叙及其籍东海，乃情理中事，是二者又实相一致也。

又按：鲍照祖籍上党及东海之地理位置，前人亦多有异说。吴丕绩《鲍照年谱》（商务印书馆1940版）云：“先生之上党，必为毗连东海者，当属徐州淮阳郡。”钱仲联《鲍照年表》（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鲍参军集注》附录）亦以为鲍照祖籍之上党“乃指南朝侨置者，《宋书·州郡志》：‘徐州淮阳郡上党令，本流寓郡，并省来配。’今江苏宿迁县地”。皆以为此上党系指南朝侨置于徐州淮阳郡之上党县而言，此后之论者于介绍鲍照生平时往往从之，然而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今考《宋书·州郡志一》所载徐州淮阳郡云：“淮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既然上党乃系鲍照之祖籍，而徐州淮阳郡之上党则为东晋末年安帝义熙中始侨立，则鲍氏祖籍之上党必非徐州淮阳郡之上党可知。今据鲍氏由上党至东海之迁徙情况，以及鲍靓籍贯上党之地理位置，则鲍照祖籍之上党应系并州之上党郡（今山西长子县一带），而以为此上党为徐州淮阳郡之上党县者则明显有误。

又按：根据前人称人籍贯之常法，虞序称鲍照“本上党人”，亦应指并州上党郡而言。考前人称人籍贯之法，其一则曰：某，某郡某县人也；或则曰：某，某郡人也。而无单称：某，某县人也之情况。其例如《魏书·尧暄传》：“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明指尧暄为并州上党郡之长子县人；《南史·孝义·韩怀明传》：“韩怀明，上党人也，客居荊州。”此韩怀明亦并州上党郡人，单言上党，并未指淮阳郡之上党县。又《魏书·恩倖·茹皓

传》云：“父让之，本名要，随巴陵王刘休若为将，至彭城。是时南土饥乱，遂寓淮阳上党。”茹让之所寓居之“淮阳上党”，方为南朝侨置之淮阳郡之上党县，而传并不单记作上党。由此，则虞序所言之鲍照籍贯上党乃系指郡而言甚明，此亦可见淮阳上党说之非是也。

又按：关于鲍照籍贯东海郡之地理位置，天一阁藏明《隆庆海州志》之《人物志》列鲍照于其中并载其事迹，因海州时治今江苏灌云，因此一些论者及文学史家以为乃指今江苏灌云而言。张志岳《鲍照及其诗新探》（载《文学评论》1979年1期）曾经指出，建置于灌云之东海乃东魏所建置。考东魏立国于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534），是年距明远之卒已七十余年，而于灌云置东海郡又在此后，由此，则鲍照籍贯东海为江苏灌云说之误不待辨矣。

又按：黄节《鲍参军诗注》之《春羁》诗补注云：“明远东海人。东海今江苏淮安府安东县北。”以为此东海乃位于清之淮安府安东县境，此安东即今江苏涟水，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后更名。钱仲联《鲍照年表》据黄节说亦以为：“此东海指南朝侨置之郡，郡治今江苏涟水县北。”近年所出版之文学史教本大多从其说，但这一说法仍然缺乏应有的依据。今考《宋书·州郡志一》云：

徐州刺史，后汉治东海郡县。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泰豫元年（472），移治东海朐。

东海太守，秦郡，汉高更名。明帝失淮北，侨立青州于赣榆县。泰始七年（471），又立东海县属东海郡，又割赣榆置郁县，立西海郡，并隶侨青州。领县二。……襄贲令……赣榆令……

《南齐书·州郡志》云：

冀州，北东海郡，治连口，……泰始初，遇虏寇，并荒没。今所存者，泰始之后更置立也。……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建元初，以东海郡属冀州。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江南·淮安府》云：

安东县。府东北九十里，北至海州二百八十里，……汉淮浦县地，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属广陵郡，齐建元年，始移东海郡治涟口县，仍侨置襄贲县于此。东魏曰海安郡，隋初废郡，改县曰涟水。

由以上所引可见，东海郡治涟口（或作连口，即今江苏涟水）乃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年间之事，其时因淮北沦于北魏，故齐高帝将原属徐州之东海郡改属冀州，治所亦南移至涟口。齐建元元年为公元479年，是时明远已卒十余年。由此，沈约《宋书》等称明远籍贯，必不可明以明远卒后所设立之治涟水之东海称之，见涟水说亦失考非是，其误盖同灌云说。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撰《关于鲍照的籍贯》一文（载《文史》第二十辑）予以论之，然而遗憾的是却并未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

又按：《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涟水，旧曰襄贲，置东海郡。”《读书方舆纪要》卷三三《山东·党州府·沂州》：“襄贲城，……县西南百二十里，战国时齐邑也，……汉置襄贲县，属东海郡，贲音肥。后汉及晋因之，宋仍属东海郡。”则见刘宋时东海郡之襄贲县位于今山东东南，处原东海郡境内，而《隋志》所云“东海郡涟水，旧曰襄贲”者，乃齐建元元年后侨置于涟水之东海郡襄贲也。此可为涟水说不足为凭之又一证。

又按：考之《后汉书·地理志》，徐州东海郡领十三城，第一属县郯县为刺史治所，亦郡治所在；又考之《晋书·地理志》，晋时徐州东海仍领十二县，其中亦有郯县；《宋书·州郡志一》：

“徐州刺史，……东海太守，领县二。”二县曰襄贲，曰赣榆。则刘宋时东海郡已无郯县，而沈约《宋书》记人籍贯时仍多有称东海郯人者。如《宋书·何承天传》：“何承天，东海郯人也。”《徐羡之传》：“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郯人也。”《虞丘进传》：“虞丘进字豫之，东海郯人也。”皆为其例，则见《宋书》记人籍贯之东海仍指汉晋时治郯城之原东海而言，而非指刘宋后期所侨立之东海。由沈约《宋书》之如此记载惯例，则其记鲍照籍贯之东海乃系汉晋时治郯城（今山东郯城县）之东海，而非此后移治涟口之东海。此又见涟水说之误也。

又按：鲍照有《春羁》诗一首，以抒发其浓厚之思乡情绪，诗有“佳期每无从，淮阳非尺咫”句，黄节《鲍参军诗注》云：“曰‘淮阳非尺咫’，思乡也。”黄注论《春羁》诗意无疑是相当正确的。今考之《宋书·州郡志》所载徐州淮阳郡所领之角城、宿预、晋宁、上党四县之地理位置及《资治通鉴》卷一三二胡三省注：“淮阳太守治角城，角城在唐泗州宿迁县界。”考刘宋之徐州淮阳地处淮水以北，在原东海郡之范围内。即鲍照所思之故乡亦为原东海之地，可为鲍照籍贯东海乃汉晋时治郯城之东海之又一佐证。天一阁藏明《隆庆海州志》之《人物志》列鲍照于其中并载其事迹，也为鲍照籍贯东海为原东海增加了又一证据。盖海州时治今江苏灌云，亦在汉晋时治郯城之东海郡范围之内也。

又按：考《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义庆附传》云：“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宋书·谢灵运传》亦云“东海何长瑜”，鲍照既与何长瑜并称东海人，则二人必同籍者。《谢灵运传》又载长瑜“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则是长瑜、何勖又同籍。何勖，何无忌之子，事见《宋书·徐湛之传》。今复考之《晋书·何无忌传》，无忌东海郯人也。则是何

长瑜与鲍照皆为原汉晋时治郯城之东海人无疑，而非今江苏之涟水人明矣。

又迁南徐州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

按：鲍照《从拜陵登京岘》诗有云：“衰贱谢远愿，疲老还旧邦。深德竟何报？徒令田陌空。”诗题之京岘，即京岘山，在京口。《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江南·镇江府·丹徒县》：“京岘山，城东五里，一名丹徒岘，相传即秦时所凿以泄王气处。京口、京镇皆因以名。……或谓之荆岘。又云此为荆山，今府西南五里为岘山。”诗所言之“旧邦”、“田陌”即家乡、田园，乃指京口无疑，是鲍照家又尝居于京口矣。

又按：西晋永嘉乱后，北方流民蜂拥南下避乱，《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充、豫、幽、平诸州，一时陷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志》云：“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文帝元嘉八年（431），更以江北为南兗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是于永嘉乱后之此种大规模移民浪潮中，鲍照祖辈作为“徐州之淮北流民”，离开东海族居之地避乱江南应是极自然之事。《宋书·州郡志一》云：“南徐州刺史，……南东海太守，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见南东海郡于晋元帝时治于海虞（今江苏常熟），至二十年后之晋穆帝永和年间起即移治于京口，汉晋时原东海郡之旧县郯等三县亦随之而移治京口。《志》又载云：“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郯、利城并为实土。”“郯令，汉旧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岘西为境。”见是时侨东海又有了实土。鲍照

籍贯东海，则其先世南渡后居京口亦颇为自然，此亦与其《从拜陵登京岘》诗以京口为旧邦者正相合。

又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五章二节云：“谭其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自永嘉截自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至南方。”而在南渡的九十万人口中，“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则比旧有人口多二万余人。”由此观之，东海鲍氏南渡后寓居京口之可能性亦极大。

又按：鲍照《拜侍郎上疏》称：“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此与其本并州上党人，又为徐州东海人，而后又迁徙至江南者亦正相合。

又迁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按：鲍照《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诗有云：“征夫喜观国，游子迟见家。”《发后渚》诗有云：“从军乏衣粮，方冬与家别。”缪钺《鲍明远年谱》（载 1932 年《文学月刊》3 卷 1 期）即据之以为“是时明远之家，殆居于建康也”。又明远《重与世子启》有云：“且仆栖迟无事，咫尺馆第，餐禀夙微，非旦则夕，居职还私，两者无异。”《鲍参军集注》此启钱仲联补注云：“按《宋书·临川烈武王传》，义庆薨于京邑。据此处文意，照家亦在京。”又鲍照《还都口号》诗有云：“君子迟京国，游子思乡邦。”段师熙仲先生《鲍照五题》（载《文学遗产》1981 年 4 期）云：“明远家在建康是有明证的。”综上所述，则鲍照当时家又居于建康也。

又按：鲍照以“旧邦”指京口，又以“家”、“乡邦”指建康，二